

百年经典
学术丛刊

姚名达 撰

中国目录学史

严佐之 导读

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命名，全面、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。与传统的、具有一定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，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；与同时代的、兼有目录学史内容的著作相比，则以纯专科学术史研究迥然而别。谓之开创，未为过也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百年经典
学术丛刊

姚名达 撰

中国目录学史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目录学史 / 姚名达撰;严佐之导读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12
(百年经典学术丛刊)
ISBN 978 - 7 - 5325 - 6142 - 1

I. ①中… II. ①姚… ②严… III. ①目录学史—中国
IV. ①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4141 号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中国目录学史

姚名达 撰

严佐之 导读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6 字数 265,000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142 - 1

G · 545 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学术,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,从清末民初起,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,融通中西,不仅肇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,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,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,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“世纪回眸”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。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,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,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,剔抉其精义要眇,更着重揭櫫其学术源流、历史文化背景,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,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,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。相信这一设计,会比单出原著,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,来得更切近可靠。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,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,珠联璧合,相得益彰。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导读

严佐之

民初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,目录学是其中之一。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次《民国丛书》编撰出版新闻发布会上,周谷城教授发言说,民初是可以与春秋战国媲美的第二个学术思想“百家争鸣”时代。此话以及周谷老浓重的湖湘乡音,给我留下很深印象。后来《民国丛书》出版了,收入第一编的目录学著作就是姚名达的《目录学》、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和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三种。

姚氏目录学著作三种之中,《目录学》是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·国学小丛书》的一种,按作者自己的说法:“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,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,所以对于目录的任何方面都简略地讲到了。”(《目录学·自序》)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一书,系采用传统史学的年表体式,截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的零星史事,依时代先后,逐件系年,汇为一编。作者曾打算把《年表》作为一个篇章合入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取名《通纪篇》,置《溯源篇》后,使读者在

具悉中国目录学渊源之后,先知全史梗概,然后逐篇研究,以免支离灭裂之弊。但事后发现此篇字数数万,条数数千,每条各占一行,篇幅几与史文全部相等,殊有枝大于干之嫌,才又重新抽出,独立成书,恢复原名,单行问世。因为《目录学》是初学入门之书,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为资料汇编,故相比之下,唯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属于原创性专科学术史著作,最符合《蓬莱阁丛书》“尤具开创性”的选辑标准。不过单就史料的丰富和通贯而言,《年表》对读者了解中国目录学史还是很有帮助的。正如作者所说:“此篇悉属原料,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,考订排比,费事最多。书成自观,殊觉乏味。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年代及其过程,则舍是莫由;苟能一气读毕,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,亦可隐约得一概念;专家用作参考,必可免翻检之烦;且读各主题篇时,必有随手比照,增加领略之功。”(《中国目录学史·叙论篇》)以是之故,建议读者如读毕此书意兴犹存,不妨再把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浏览一过。

—

据我知见,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“中国目录学史”命名,全面、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。与传统的、具有一定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,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;与同时代的、兼有目录学史内容的著作相比,则以纯专科学术史研究而迥然有别。谓之开创,未为过也。

晚清革制,朝廷派员出洋考察,学习先进,最先效法并比较见实绩的,大概要算是西方的学校和图书馆了。随着图书

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,西洋现代目录学思想理论也很快传入,治图书目录学者,除少数仍固守传统外,大都能抱接受和吸收的态度,唯程度不同而已。我们看姚名达《目录学》一书的篇章名目,全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建构的阐述模式,可见这位出身清华园的年轻学者对外来新学的积极态度。再看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开卷即先解释目录、目录学的概念和定义,目录学的种类和范围,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,也颇具现代学科理论建设的气象,但其篇目结构却与悉仿西学的《目录学》不尽相同,有点“中西合璧”的味道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结构以“篇”为主题,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;各篇每节,但立标题,不标序数。全书凡十篇,依次为:《叙论篇》、《溯源篇》、《分类篇》、《体质篇》、《校讎篇》、《史志篇》、《宗教目录篇》、《专科目录篇》、《特种目录篇》、《结论篇》。如果算上后来抽出单独成书的《通纪篇》,就该是十一篇。显然,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,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,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,比如清末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、民初蒋元卿的《校讎学史》等。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这种方法称作“主题分述法”,并解释其义说,就是“特取若干主题,通古而直述,使其源流毕具,一览无馀”(《叙论篇》)。

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去组织中国目录学史?因为在他看来,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,但发展进程中的“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”,硬要划分时期,区别特点,“强立名义,反觉辞费”(《叙论篇》)。这样解释或许还有点儿费解,那就让我们参见姚氏《目录学》第二卷第七章“目录学的趋势”里的一段话。他说:“中国过去的目录学,造端于刘歆《七略》,发扬于

两晋南北朝,收萎于清季,复兴于今日;但其形态仍不能跳出《四库》的范围外。再可以说一句,自刘歆创《七略》后,虽有郑樵、章学诚等加以精讨,但其范围,只是平面的发展,并没有直线的进步。换言之,自西汉至今日,虽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,而目录学一科,仍就是在一个圈子内打走围,正如同其他学术一样没有进步。”由此可知,姚氏所谓“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”,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仍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。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,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“断代法”来编写(吕绍虞《中国目录学史稿》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),但我们对他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需见仁见智的。问题在于,用“特取若干主题,通古而直述”的方法,是否能够,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“源流毕具,一览无余”呢?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不足,他说:“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,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,不能识其全貌;盖有经无纬,则组织不能周密也。一则文气所至,不便琐陈,以至时代不明,后先倒乱;盖既分题各篇,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,故忽今忽古,使读者迷乱莫明,尤其大患。”利弊相权,怎么处理?姚名达的理念是:“体例为史事所用,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”;具体对策是:“依史事之所宜,采多样之体制”(《叙论篇》)。就是说,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各篇将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史法体制,而不强求一律。理解这一点,就比较容易读懂《中国目录学史》“主题分述法”框架结构的理论含义了。

《叙论》、《结论》两篇各居首尾,在全书结构中的意义不言而喻。《叙论篇》首先对“目录”、“目录学”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,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作了分类,在——分析目录学与其他

学科的关系后,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,未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,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。提纲挈领,宣示宗旨,很符合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规范。《结论篇》以极短篇幅,分别阐述他对古代、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,实际上也是其目录学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。

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结构的主体。第一《溯源篇》,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——刘向《别录》和刘歆《七略》。设立这个主题,完全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:《录》、《略》虽然开创了目录工作和目录体制、分类的基本模式,但也导致了二千年来目录学没有重大突破和飞跃进步。传统目录学既受其庇荫,又长期笼罩在它的阴影中。所以率先引领,以其下各篇主题之根本。该篇除详述《录》、《略》分类、编目特点外,举凡书籍之产生、传述、整理、校勘、写定以至插架,莫不一一推寻原始,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,详详细细,原原本本。其叙事阐释方式,与其他各篇以主题为纲领的笔法不同,作者自称是“混合叙述”、“追问法”。

《溯源篇》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,通古贯今,看似“独立特行”,互不相干,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结构暗合。如原来设置在《溯源篇》之下的《通纪篇》,姚氏即明确说是“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”(《叙论篇》),后来无奈抽去,纪传体制便缺了“本纪”一角。现在紧接《溯源篇》之后的是《分类》、《体质》二篇。为什么?因为姚氏认为,“分类与编目为目录学之两大巨轮,故首及之”(《中国目录学年表·导言》)。并设定其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“志”。为什么是“志”不是“传”?因为这二篇的主题“分类”和“体质”(编目),乃古代目录制度结构最本质的两大要素,性质与其他以目录类型为主题的各篇

不同,故其论述方法也不同:“皆所以勘同析异,明变求因,上下古今,分别学派,合数十家为一段,不复胪列条别。所用体例,盖如正史之书志,以事为主,不以人或书为主,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。”(《叙论篇》)《分类篇》讲图书分类法,上自《七略》,下至杜威,尽录古今目录分类之纲要,并论其要旨,评析得失。《体质篇》讲编目的方式方法,因以著录、解题、引得、小序、总序等为“构成目录的质料”,以活页、辞典、类书、年表、散文等为“目录构成之体式”,故改以“体质”为篇名。众所周知,“志”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,《分类》、《体质》二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,故效其书法,可谓形质兼具。姚氏认为这两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:“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,必亦于此求之。”(《叙论篇》)其中《分类篇》“探讨最深,分析最精”,作者自觉比较满意。《体质篇》则“搜集未广,论证未详”,作者自我批评“最陋劣”。但读者不要因此轻忽此篇,其实里面还是有不少启发人思之处的。

由于《分类》、《体质》二篇都是根据古今公私藏书综合目录的演变来叙述的,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具特质的目录则无暇顾及。如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,与一般书目大相异趣的宗教目录,与综合性目录相对应的学术专科目录,以及那些“性质特别而不限于一科”的目录,等等。所以作者又另作归纳分类,按“史志”、“宗教目录”、“专科目录”、“特种目录”立题名篇,各各阐述。若以《通纪篇》之为“纪”,《分类篇》、《体质篇》之为“志”相推拟,那么这几篇的性质、体例,似正可视为纪传体之“传”。《史志篇》以时代为主,凡正史国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后世补志,莫不加以评鹭;《宗教目录篇》以佛教目录为重点,兼及道教目录、基督教目录;《专科目录篇》对经解、哲学、

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文字、教育、科技、艺术等学科的目录与索引，逐一叙述，溯古详今；《特种目录篇》“取为数较多者”，分列丛书、个人著作、地方著作、禁书、刻书、阙书、版本、善本、敦煌写本、举要、解题、辨伪十二门类，并兼及有关妇女著作、家族著作、学派著作、日报要闻、杂志论文、参考书、书评、外国人书籍的目录和索引。这与纪传体史书以儒林、文学、循吏、佞臣等分门别类为人物立传，不是很有些貌合神似吗？

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构想，借鉴传统历史编纂法，使“主题分述”以致结构割裂的负面影响得以消弥。所以我说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结构框架有那么点“中西合璧”的味道。

篇目结构中唯《校讎篇》似稍嫌突兀。此“校讎”盖指广义的整理，而非狭义之校勘。为什么要设立此篇？因为姚氏觉得目录乃由校讎而来，“校讎在目录之先，目录为校讎之果”，“总目录之成，多先经校讎之手续”，“史志之成，莫不据秘阁之校讎”，二者呈因果先后关系，而《分类篇》、《体质篇》仅按总目录的形态特质来叙述分类、编目的演变，没有涉及“前因后果”，所以要另以“校讎”立题设篇，“以述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”。但以我之陋见，目录之学固然由校讎而来，若谓之密不可分，那也只是维系在朝廷秘阁藏书这一层面上。如作者所说：“古之书籍，未经校讎，难于著录，故两事相因，不易分辨。中世以藏书为炫耀，秘府往往抄写旧书为一律之体式，校勘整理俱所不免，写定之后，亦有目录。近世私家善读者，则广勘众本，考定异同，择善而从，蔚成专科之学。藏者不必能校，校者不必自藏，目录学之与校讎学（校勘），遂截然两途矣。”（《校讎篇》）秘阁校书既与官书总目录相因，写目录学史当然不能不顾，但二者既已截然分途，叙述亦宜以目录为纲，与其

为“校讎”谋篇,不如为“公私藏书总目录”立“传”,凡“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”,都附系于各重要秘府书目下逐一铺展。这样,既照顾了目录学与校讎学的这层关系,又避免了理论框架上的结构“错位”,同时也可使目录之“本传”更显丰满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的理论框架决非无懈可击,但确有创意。姚名达《自序》提及此事亦颇为自许,说:“对于编制之体裁,杂用多样之笔法,不拘守一例,亦不特重一家,务综合大势,为有条之叙述,亦一般不习见者。”在我看来,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。

二

早在《民国丛书》出版之前的1957年,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就已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重印。著名图书馆学家、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再版《后记》中说:“姚名达先生的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,今天我们来翻印它,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。在过去几十年内,关于‘中国目录学史’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,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,或在编写内容方面,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作为最好。”这是很有权威的评价。姚著于文献资料广采博搜,读者随手翻检,即可领略,自不必于兹赘言。至于编写内容,作者《自序》尝称“书中论断多出心裁”,并“姑举数端,聊示一斑”。若《别录》无辑略,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属丛书,《隋志》分类乃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嫡裔,佛经《旧录》、《别录》即支敏度《经论都录》、《别录》;若目录必兼有解题和引得,丛书必须拆散归类,文集宜改入总类,等等。今亦就读书所得,略举数端。

首先说说“解题”。姚名达虽然为中国目录学写下洋洋洒洒的通史,但他对古代目录学成就并不推崇,总体评价甚至较低,认为“二千年来校讎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”,质疑“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”(《叙论篇》)。独有“解题”得到他不吝其词地赞赏,说是传统目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、唯一优于西洋目录的地方。

重视解题的作用、意义,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并非开先之作。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》提出“篇目”、“叙录”、“小序”为传统目录体制三大要素;且以“解题”取代“叙录”,区别目录种类:“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,书名之下有解题者;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;三曰小序、解题并无,只著书名者。”并强调解题于目录之学术性尤见重要:“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,固薄其浑漫,视为无足轻重;即有解题,若其识解不深,则为美犹有憾。”“凡目录之书,实兼学术之史,帐簿式之书目,盖所不取也。”《目录学发微》虽迟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,但余嘉锡从1930年起即持为讲义,在北京各大学讲授,翻印传抄,习者众多。他的“目录体制”学说,旋为后来目录学著作承袭沿用,视同经典。如1931年出版的刘纪泽《目录学概论》,论体制、派别,就已一本其说;姚名达《目录学》“目录的派别”一节亦同其说,该书出版于1933年。不过,余嘉锡论述解题只在原原本本推寻叙录体例的本原,对其发展衍衍出来的各种变例无一阐发,而这在《中国目录学史》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。

书中论解题者仅三四处,篇幅也都不大,但其见解、论断颇有新意,并多能切中肯綮,发人思考。比如他提出目录分类应从多方面着眼,若“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,则有纯书目(有仅记书名、著名、卷数者,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)、纯解题(有

于书目后作解题者,有于书籍中做题跋者)、兼书目及解题之异”(《叙论篇》)。又比如他在区分目录体制时撇开“小序”,突出“解题”和“书目著录”,打破了余氏按“篇目”、“叙录”、“小序”三要素区分目录的框樊。这是从宋元以后目录实际出发重新树立的区划标准,很有道理,大有必要。因为事实上有小序的书目只占很小比例,特别是宋元以后,罕见“有小序而解题者”,唯多“有解题而无小序者”,再按余氏标准类分,根本行不通。另外,清以来书目著录变化很大,书名、著者名、卷数及其他参考项,大大超出原初“篇目”的内涵,再固守余氏标准,根本管不住。所以后来有人就按有无解题分作两大类,但还不及姚氏合理,因为确实还有“兼书目及解题”者,比如清代张金吾的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。遗憾的是,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后世治目录学者的充分重视。

书中又正式提出“解题目录”这一概念,并予以体例、内容上的分类和分派。说自刘向《别录》出,“遂开后世解题一派,然目录未必有解题,解题亦未必皆同体例。刘向《别录》所开之风气,后世有完全接受者,有撮取精华者,有偏举局部者”(《体质篇》)。又说“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,则有解释内容、订正讹误、考索存佚、研究版本、批评是非、叙述源流之异,又或兼而有之”(《叙论篇》)。所谓“完全接受者”,是指能对《别录》体例“皆一一详论”的目录,如刘宋殷淳《四部序录》、唐元行冲《群书四录》、北宋《崇文总目》、南宋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一类。“撮取精华者”,指“各方面皆已论到,而又不如《别录》之详尽”一类,如刘歆《七略》、唐毋煕《古今书录》、清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等。“偏举局部”包括二方面意思:一是指那些“精神时有所偏,不能每书皆逐一研究其各

方面,体例不能纯洁”的目录,如刘宋王俭《七志》、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明高儒《百川书志》等;二是指那些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发展的目录,如清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、黄丕烈《百宋一廛书录》、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“特别注重版本方面”,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经籍考》“备录成说以备考证之例”,等等。

此外,《特种目录篇》还专设“解题目录”一节,主要讲两个问题。一是讲古代的解题目录。说“解题”之名始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陈、晁二志“详略略等”,与《七略》、《七志》“同一系统”,与《四部序录》、《古今书录》、《百川书志》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“皆相附而成流派”。说解题目录就是《别录》体制的“撮取精华”一派和“偏举局部”一派,较之《别录》及其“完全接受者”,“则具体而微”;“较之一般有目无叙录者,则增出‘解题’之语”。这与《体质篇》说法小有差异,不知是后来的改变还是本来的疏忽。二是讲现代的解题目录。说古代解题“皆典藏目录”,与现代解题的概念不一样,“现代之解题实即读书指南,非复古义矣”。并举吕思勉《经子解题》、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为例,介绍其体例内容特点。

总之,《中国目录学史》论“解题”,文字不多,篇幅不长,观点未必完全正确,论述也不够周详严密,但却富有学术上的创意和挑战性。我们尽可不必苟同,却不能无视或轻视。可惜其中不少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,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争辩讨论。学术欠长进,回头再看,竟然新意犹在。

其次谈谈《宗教目录篇》,主要是其中的佛经目录,着重看作者治目录学史的方法。

《宗教目录篇》是文字最多的一篇,几占全书四分之一。

从整体看,确实有些失衡,反过来说,当然最为详尽。尤其讲佛经目录;在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著述中,似尚无出其右者,欲知佛录史,此书甚宜。不过对此篇感兴趣的不会多,读者往往匆匆翻过,草草了事,我初读就这样,基本上没看。但是,如果看佛录只在求知佛门经籍,那么没兴趣的不读也罢,若是为了通览中国目录学史,不读就缺了一大块。为什么?因为佛经目录在学术方法上有不同并转胜于一般目录的地方。姚名达说:“晋宋四部目录初亦兼收佛经,《七志》、《七录》且特为佛经、道经新增二录。而后来帐籍终于分道扬镳,不相为谋。正统派之目录学家既局于四部之范围,坚拒异端,高自标置。而佛道之徒亦别立门目,不复寄人篱下,抄集结藏,著录成目,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。特以其书深隐丛林,故不甚为流俗所重。”(《宗教目录篇》)他在《目录学》第三章“佛经目录”中还说:“目录学史中,最值得我们佩服的乃是佛经目录。它所用的方法,比普通目录优胜的,至少有五点:一、历史观念很发达,每一部书的传译渊源、译人小传、译书时间、译书地点,都记载得详详细细。二、辨别真伪很严格,凡是可以怀疑的书,都仔细考证,明白辨别。三、比较异同很详审,一部书有数种译本的,都详细列举,比较它们的异同得失;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部,或在一部书里抽译一二篇,而另题书名的,都一一根究它的出处,分别注明,使得学者不致迷惑。四、搜采遗逸很勤劳,虽是已佚的书,亦必保存它的名目,以候采访,使得学者可以按照某时代的目录而知道那部书是何时佚失了。五、分类极复杂而很周备,或照著译时代分,或照书的性质分;性质里面,或照书的涵义内容分,例如既分‘经’‘律’‘论’,又分‘大乘’‘小乘’,或照书的形式分,例如一译多译,一卷多卷;

同一目录中,各种分类并用,同是一书,而依它类别的不同,交错互见,常常数十次,使得学者便于检查。假如读者不信,请一看僧佑、法经、长房、道宣诸僧的作品,便不能不鄙薄《七略》、《汉志》、《新簿》、《七录》实在太简单,而且不能不叹惜此后各种目录太没长进了。”这样的结论虽说未必恰如其分,然而治目录学者确实不能对佛录的分类、体制一无所知,即使他并无兴趣。

《宗教目录篇》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目录、佛教目录和道教目录三部分,而于佛录历史之论述,用力最深,不仅是材料的搜辑,更在于方法的运用。作者《自序》在追述此书编撰缘起时说:“其始原欲博收精考,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,故逐书考察其内容,逐事确定其年代,逐人记述其生平,依年代先后叙成系统,佛教目录即其残迹。著作过半,始知其规模太大,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,亟毁已成之稿,改用主题分篇之法,撷取大纲,混合编制,几经改造,遂为今式。”由此可知什么才是作者最初构建目录学史的理想方式。所以我们除了需要理解此书整体框架,还应该了解佛教目录部分的结构和学理。那是怎样的叙史方法呢?显然就是上文说的“逐书考察其内容,逐事确定其年代,逐人记述其生平,依年代先后叙成系统”,即以成书年代为经,具体佛录文献为纬,来编织历史的方法,所谓“文献史”的方法。这种方法没有凭空托大之弊,能臻实事求是之真。很多学科专史都适用此法,比如易学史、诗经学史、小说史、戏曲史等。而依我陋见,它犹似目录学的方法,所谓“逐书考察其内容,逐事确定其年代,逐人记述其生平”,无非就是详尽的书目解题或提要。我甚至觉得目录学史就应该这么写,因为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、理论,见诸文字的实在